

中山舰事件与蒋介石“以退为进”策略

叶昌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最后夺得了国民党和军队最高大权。本文试图从蒋介石采取这个策略的原因、表现和目的三个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蒋介石阴险狡诈的反动本质,不妥之处,祈请专家指教。

一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所精心策划的一次反苏反共和反对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件。通过这个事件,蒋介石一箭三雕地打击了共产党,抑制了苏联顾问,逼走了汪精卫,因此,从事件的结果来看,应该说蒋介石是赢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蒋介石在得手之后,不是就势进攻,而是停锣息鼓,玩弄两面派手法,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究其原因:

一是广州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硬”立场和坚决斗争。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可以说是一次反共试探。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如果我们示弱,他就要得步进攻;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1]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陈延年、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采取了何种态度和立场呢?据茅盾回忆,3月20日早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到苏联顾问住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并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2]据包惠僧回忆,当天上午,周恩来还赶到蒋介石发动事件的指挥部和扣押共产党员的场所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并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员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扣押人员。^[3]同日,陈延

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人还立即召集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他们说明事件的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4]此外,3月21日和30日,中共广东区委就中山舰事件两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严厉驳斥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诬蔑,揭露他们企图通过反共,达到“破坏联合战线”,“分裂国民党及排除党内革命分子”,“使国民政府丧失工农群众的拥护,以动摇它的基础”的阴谋,号召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起来打破敌人的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5]由此可见,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有的甚至主张直接与蒋介石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这些斗争仅仅是“指责”、“质问”、“驳斥”、“揭露”而已,并未见诸“武力对武力”的行动,但这对蒋介石的“试探”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缩回去”,改变打击共产党人的手法。

二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从国共合作之日起,国民党左派人士就同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以及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中共同战斗,一损俱损,一荣共荣。这时,面对着蒋介石新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疯狂进攻,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不畏强暴,纷纷挺身而出,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行径。如:何香凝听到事件的消息后,立即冲破蒋介石军队岗哨的重重盘阻,来到广东造币厂,当面指责蒋介石并要求其立即解除包围,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6]邓演达斥责蒋介石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事件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7]柳亚子则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8]。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无疑,对蒋介石也产生了一定

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采用新策略。

三是蒋介石考虑到他的力量尚不够强大和惧于各军的不满。当时就广州一隅看,蒋的武力占优势,他有一个师和一个营的兵力,但就广东、广西整个局面而言,蒋的兵力则居劣势,因为在国民革命的六个军中,他实际能够掌握的军队只有第一军,而且第一军中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而且蒋的行为引起各军的不满。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时的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⁸事实也是如此。据谢华回忆,20日晨,谭延闿、朱培德在会见蒋介石时,谭延闿指责蒋介石说:“总理逝世才一年,骨头还没有冷,你干什么呢?国共合作是总理生前的主张,遗嘱也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现在的行动,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允许吗?”⁹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等还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址,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他们称蒋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顾问团的印象是:“全体皆对蒋介石表示反对。”¹⁰谭延闿还曾吩咐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的第二军驻扎在北江一带)。¹¹各军军长的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又虑及到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一味干下去,就有可能遭到各军的起而攻之,则自己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蒋介石只得见好即收,改变策略。

四是蒋介石慑于中国共产党仍有力量,不敢马上和革命势力完全决裂。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部分共产党员,使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此时的蒋介石不比1927年4月的蒋介石,革命形势也大不一样,这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革命群众的力量仍很雄厚,不仅可以动员黄埔军校学生军和一部分军队,而且有十几万有组织的工人做后盾,并且还有许多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这种雄厚的力量,对蒋介石必定产生震慑作用。正如周恩来所说:“当时他(蒋介石)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¹²

五是蒋介石深知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其“导师”张静江的劝告。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本身是一场军事冒险和政治赌博行为,因此深知自己的处境是“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薄濒危”¹³,唯恐猝然不义使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从而惶惶不可终日,处心积虑地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正在这时,远居上海的蒋介石尊之为“导师”的张静江“不辞道远,抱

病南下”¹⁴广州,他知此时的蒋介石羽翼未丰,则力劝其不可操之过急,不可过早亮出反共底牌,宜暂时隐忍,他向蒋介石指陈曰:“共产党徒病幼稚,无拳无勇,终何能为?”并面授机宜“止其包办之(农工)运动而约束之,必可就绪。”¹⁵这对处于迷津之中的蒋介石来说,犹如救命的咒符,定当欣然听之从之。

六是蒋介石为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财力和物力的帮助。蒋介石虽然这时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但他深知要完成“北伐”,并通过“北伐”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进而掌握全国政权,如果得不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的支持,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他是寸步难行、难以得逞的。他当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二年来联俄、联共“对于革命势力之增长,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对帝国主义的影响,实非浅解。由此观之,对于此两种势力,实有联合之必要。”¹⁶这种“利用”心理,也使他不愿马上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矛盾激化,从而在事变后不久就偃旗息鼓,改弦更张了。

总之,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激起了各种势力的共愤,这种共愤对蒋介石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再加上蒋介石个人的“虚弱”和“利用”心理,因此,他在权衡利弊、盘算得失后,收敛起其进攻的势头,转而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反革命策略。

二

从历史上看,玩弄权术、阴险狡诈是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而对于反共反人民的罪魁、阴谋家野心家的蒋介石来说,弄权耍术既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最主要的特征,也是他的惯用伎俩。中山舰事件后,为了欺骗、麻痹苏联顾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及一切善良的人们,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施展两面派手腕,导演了许多的骗局。主要表现在:

其一,自请处分。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擅自行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做法,不仅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的强烈愤慨,也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普遍不满,在这种众愤下,蒋介石为寻找退路,3月23日,他上书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方面竭力为自己辩护:“惟

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另一方面则虚假地承认:“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并要求“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1]蒋介石这种自贬三级、负荆请罪的举动和不像胜利者的形象,使当时义愤填膺的民情、众怒难犯的气氛缓解到最低限度。

其二,缩小事态。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尽量缩小打击面,以力避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在许多场合中声称中山舰异动“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李之龙)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身上。”^[2]宣布“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没有关系的”,^[3]主要责任只在李之龙,即使对李之龙亦不想探究,因他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即使共产党也只在黄埔军校的第一军内,目的在于“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4]与其他各军无涉,恳求汪精卫和其他各军的谅解与支持;对于苏联顾问则谎称“对人不对俄”,仅仅要求撤换季山嘉等三人,而欢迎鲍罗廷、加伦速回广州,继续合作。一场反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革命武装暴乱,就这样被蒋介石用花言巧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其三,舍卒保帅。当利用事件挑起政治风波的目的已经达到,制造事件的真相渐已暴露的时候,为掩饰自己的阴谋诡计和免使自己陷入被动,蒋介石又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宣布事件本身是个“误会”,释放了李之龙,并把“误会”的一切罪责推到“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身上”,^[5]处分了制造事件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免去王柏龄二十师师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责令他们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新编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要塞监禁;其他如欧阳格、陈策、徐樾等也都受了处分。这样,蒋介石就以领导者的超然身份,“公正”地处理了中山舰事件的肇事者,以“舍卒既以保帅”的办法取得了主动权。

其四,打击右派。“中山舰事件”消息传开,亲者痛,仇者快。香港海外报纸大肆渲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齐声喝采,向蒋介石欢呼“万岁”,恭维他“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鼓动他反共“必须彻底,努力为之”。^[6]孙科、胡汉民这些反共老手亦纷纷出笼,幻想同蒋介石结成反苏反共的“神圣同盟”。但蒋介石毫不领

情,竟通电全国,严词斥责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等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7]宣布西山会议派的二大会议为“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大家都要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要当他们是党的罪人,是我们全体党员的仇敌。”^[8]此外,不仅以破坏省港大罢工为名逼走了伍朝枢(伍当时任广州市长,是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还故意冷落胡汉民(胡是老右派,蒋介石拒绝了胡向蒋提出的反共建议,迫使其灰溜溜地再度出走香港)。蒋介石这种不肯与右派同流合污的假象,不要说善良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他弄糊涂了,就连邹鲁这样老奸巨滑的政客也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去年三月中山舰事,我们去电奖勉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9]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10]的鬼把戏。

其五,“总理信徒”。事件后,蒋介石始终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以“总理信徒”自居,强调“不偏不倚”的立场,为自己戴上“护身符”。3月22日,蒋介石第一次公开谈论中山舰事件时,就强调要“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做“总理真正的一个信徒”。说“如果校长背叛了三民主义,成了一个军阀,那就要先打倒我校长才好。”^[11]4月3日,又说:“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12]因此,“总理信徒”是蒋介石无论在举起左手打击右派,还是举起右手打击共产党和左派时都要念念有词的“护身符”。蒋介石藉此在当时确实欺骗、蒙蔽了一些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使人们一时难以辨明他的反革命真正用心。

其六,大唱高调。古今中外的野心家、阴谋家在没有公开暴露真面目时必乔装打扮,大唱高调,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蒋介石也是这样。事件后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场所,大唱左的高调掩饰其右的反革命行为。事件时明明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事件后却高喊:“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13]还说:“如果离开共产党,国民革命亦不成”,所以“希望本党同志及共产党同志,实力团结,努力国民革命工作”。^[14]并表示

“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2];明明命令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事件后他却标榜自己是“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3],还对工农的革命作用大加吹捧,说“没有农工的帮助,国民革命军也决不能成功这样快”,“工农能来革命,这个革命才能成功”,因此“我们此时惟有更加巩固工农兵的联合阵线”^[4];事件时明明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要求驱逐季山嘉等人,事件后却高度评价苏联的帮助,说“俄国力量,直接间接帮助我们”,认为“故要革命成功,须联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联合世界革命力量后,中国革命方可成功,总理主义政策方能实现”^[5],甚至提出“不但应该和第三国际联络,而且还承认他是在指导的地位。”^[6]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蒋介石的虚伪、欺骗性,其两面派的嘴脸更加暴露无遗。

上述可见,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审时度势,假作“退缩”,并玩弄权术,施展手段,进行了许多两面派的活动,其目的是麻痹人们,准备力量,以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发起新的进攻,以谋取更大的反动权力。

三

从根本上说,蒋介石当时的“退”是为“进”作准备的,是为攫取更大的权力而服务的。在时机成熟、“孤孽颠危”的困境改变后,他就会由“退势”改为“攻势”。事实正是如此。事件不久,由于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华顾问首先对蒋介石实行了“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根据他们的指示对蒋采取了“和解”的立场,此时国民党党政军领袖汪精卫也由于苏方对蒋妥协和得不到各军军长的支持而负气出走,再加上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国民党实力派的迅速转向,使蒋介石在政治上消除了对手,军事上免除了后顾之忧,这样,反蒋的政治、军事压力基本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加快了夺取全党党权和军政大权的步伐,在理论、军政、党务等方面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首先,在理论上大肆鼓吹和贩卖“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动理论。事件后不久,蒋介石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人时发表讲话,声称:

“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7]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蒋此时已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之意。不过限于时机,他这时的话讲得还比较含蓄。然而,他觉得时机成熟,便直言不讳了。5月27日,他对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宣称“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8],“一个团体只可信奉一个领袖,才能发生效力,才不会落空。”^[9]在6月7日军校纪念日上,蒋介石更加露骨地声称:“要是一国有两个革命党,这个革命也一定不能成功;只有一个党和一个主义的,这革命才可以成功”,“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革命若不是由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这革命便要失败的。”^[10]蒋介石这一反动理论主张的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是戴季陶主义的翻版;是为其攫取党政军大权制造舆论。

其次,在党务上抛出了旨在排斥和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蒋介石觉得时机成熟,立即着手从国民党党务方面向共产党发起新的进攻,以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还在4月1日,蒋即炮制了一项所谓“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提议“于一周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整理纪律,检查分子。”^[11]4月3日,蒋提出对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并提出共产分子应暂时退出各军。^[12]4月26日,蒋又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会议案。5月15日至22日,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蒋介石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名,接连抛出四个所谓“整理党务”的提案,其核心内容就是要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会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员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后才能下达,等等。显然,蒋介石制造“整理党务案”,其“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13],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14]

再次,在军政上步步进攻,掌握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凡此一切,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⁹通过这一连串的进攻,蒋介石企图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目的获得了相当的成功。4月16日,蒋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1日,蒋被任命为组织部长;5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军入部部长(有任免所辖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之权);6日,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7月7日,颁布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无限扩大了总司令的权限。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¹⁰,等等。这样,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内,年仅39岁的蒋介石就独揽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和财政大权,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辈一跃而成为大权在握的国民党铁腕人物。至此,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策略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从此,他步上了国民党权力的顶峰,这就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① 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见《浙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③ 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前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④⑥ 见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上册)第488页。

⑤ 见《人民周刊》第7期,1926年3月3日版。

⑦⑭⑮⑰⑱⑲⑳㉑ 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

⑧ 王昆仑:《诗人·学者·战士》,见《人民日报》1983年6月21日。

⑨⑬⑳㉒⑳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123、121、122页。

⑩《大革命的一点经历》,《谢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页。

⑪ 斯切潘洛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4页。

⑫ 方鼎美:《补叙中山舰事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刊稿。

⑬《张静江先生文集》,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2年6月出版。

⑭ 致中:《广州事变之研究》

⑮⑯ 杨树标:《蒋介石传》第83、86页。

⑰ 宋平:《蒋介石生平》第142页。

⑱《蒋校长辟谣之谈话》,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7日。

⑲《清党实录》第209页。

㉑《蒋校长通电》,载于《黄埔潮》第46期。

㉒ 蒋介石:《四月九日训话》,载于《蒋校长演讲词》。

㉓ 邹鲁:《西山会议》。

㉔ 蒋介石:《中山舰案对第四期学生训话》,载于《蒋校长演讲集》。

㉕《蒋校长通电》,载于《黄埔潮》第46期。

㉖《蒋校长演讲词》,1926年5月。

㉗⑳ 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理由》,载于《蒋校长演讲集》。

㉘ 蒋介石:《总理纪念周训词》,载于《蒋校长演讲集》。

㉙ 转引自《人民周刊》第7期:《一月迷评:三月二十日的戒严》。

㉚ 蒋介石:《工农大联合》1926年5月2日。

㉛ 蒋介石:《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日演词》,载于《蒋校长演讲集》。

㉜ 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代表演讲词》,1926年5月。

㉝ 蒋介石:《军校纪念周演讲词》1926年6月7日。

㉞ 蒋介石:《整饬党务军备》,1926年4月3日。

㉟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21页。

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1926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第119页。

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1926年7月7日,《军事政治月刊》第4期。

(责任编辑 汪高鑫)